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一三期 ——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11f)

【文革亲历】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	穆 欣
【史海钩沉】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	尹家民
【历史回顾】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	戚本禹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文革亲历】

### 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

• 穆 欣 •

自 1966 年 5 月中国大地上刮起“文化大革命”的飓风，中央文革小组住进钓鱼台后，这里就不再是往昔那座平静安谧、妩媚可爱的园林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 1966 年 5 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 15 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 24 小时不停地连轴转。6 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作秘书，仍然忙得难有喘息的工夫。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 号楼难以容纳了，7 月初将办公室搬往 11 号楼。

7 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 11 号楼搬到 16 号楼。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 7 座楼房。17 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中央文革小组使用。

#### ◇ 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关系也是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

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经常在各种场合声称“我代表毛主席”，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接着就是江青哇啦哇啦，讲个没完。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在会议室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

在这个小组里，好多事情都不成体统。例如最得江青宠信的小组成员戚本禹，上窜下跳，全无章法。江青要整什么人，到田家英处抄家，诬陷邓拓为“叛徒”，在报刊上批判刘少奇，在群众中散布“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煽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在中南海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并去抄家，带领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安营扎寨“揪刘少奇”，在外交部门门口聚众寻衅揪斗陈毅，都叫戚本禹去打头阵。江青在小组里要整什么人，也是戚本禹先放炮。他为江青立了“功”：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中，诬陷邓拓是“叛徒”，5月16日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第二天晚上邓拓就含恨离开人间……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刘志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在一次会议上，刘志坚反映1966年11月8日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时，坐在旁边的小组成员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拍着桌子漫骂刘志坚“胡说八道”。刘志坚据理驳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你们不信可到现场去调查。”戚本禹继续纠缠，无理取闹，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如此粗暴地打断别人发言，反而指责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为什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由于江青的怂恿，戚本禹越发得意忘形，直至发展到异常狂妄的程度。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由陈伯达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过程中，刘志坚和王任重等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但都没有被采纳。如在《决定》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中说：“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志坚在讨论中曾经建议删去“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那一段话。他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他们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因此，刘志坚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个《十六条》的草稿原来有二十三条，经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参与修改为十五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讨论这个文件草稿时，刘志坚基于“部队无论如何不能乱”的思想，提出要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出某些特殊规定，做些必要的限制，以利于部队稳定。这个意见多次遭到江青、陈伯达一伙的反对，刘志坚据理力争，坚持加上这一条，又得到周恩来、陶铸和老师们的支持，后经全会通过，在文件中加上一条（作为这个文件的第十五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这个文件也由原来的十五条变成十六条。

#### ◇ 排斥陶铸、王任重、刘志坚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像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问题、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

江青依仗权势，要求周围的人都得唯她的意志是从，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在她看来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可是，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居然厚着脸皮说：“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初时小组确曾偶然有过“吵架”，实际上凡曾和她“吵过架”的同志，无不遭到她的残酷迫害。1966年年底，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进行残酷迫害。

兼任北京市“文革”顾问的王任重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经常受到江青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指责，江青指责他：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对他的言行时时找茬儿，对他的工作处处掣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抓住北京市印发西城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会议上连续对王任重进行批判，诬蔑他是什么“背着中央文革搞阴谋活动”。1966年12月16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对王任重突然袭击，当众诬陷他是“保守组织”的“后台”。江青事先不让通知王任重参加，在会上讲话时点了王任重和周荣鑫、雍文涛的名（还逼周、雍二人“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突然宣布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唆使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陶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又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初来北京工作时，江青原曾妄图拉拢他反对邓小平。但是陶铸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没有这么做。1966年11月29日，江青召开科委系统万人大会，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事先都不知道。陶铸到会时说了一句“怎么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就厉声说：“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

1967年1月4日，江青伙同陈伯达，背着周恩来和陶铸本人，当众煽动造反派“打倒”陶铸。这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治病），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都在会上公开点陶铸的名，硬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

江青说：“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去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

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例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王任重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又说：“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吵了多次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

康生诬陷陶铸说：“他是叛徒！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从此陶铸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终被迫害致死。

就在江青一伙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的同一天，他们又当众宣布“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

刘志坚作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始终坚持“军队不能乱”的思想，尽力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因此经常受到江青一伙的指责攻击。他根据部队实际情况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以及其他老师的意见，主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工作期间起草的许多文件、发给部队的电报，都被江青、陈伯达扣压，还常批评他“压制革命”、“镇压群众”。

1966年10月1日，部队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给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全军文革小组只得起草一个《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的草稿基本上坚持党的领导，并尽可能在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林彪叫把文件草稿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看了，对草稿十分不满，立即大删大改。张春桥把改了的稿本交给刘志坚的时候，还说“一个字也不准再改动”。刘志坚为此同张春桥争吵起来。刘志坚说：“取消党的政治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诡辩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当时争论激烈，却毫无结果，这个文件还是经过毛泽东同意下发了。《紧急指示》下达后，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等人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禁止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行动。林彪把这个通知转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不发。

一个人只要被江青盯上了，她就会处处找茬陷害，别想再有片刻安静。中央文革小组住进钓鱼台后，刘志坚和谢镗忠还住在家里。在全国学生大串联开始后，刘志坚原来的住处日夜有大批红卫兵上门，弄得无法休息。又因中央文革小组经常开会到深夜，他就在王任重住的钓鱼台二号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因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住在西山，刘志坚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叶帅要他搬到西山去住，以便及时商量处理军队“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刘志坚11月间就搬到西山去住，这就更加引起江青对他的怀疑和忌恨。刘志坚说：“1966年12月12日，即在康生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把我抛出交给学生揪斗以前23天，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开始点我的名。在一次会上她说：‘你与王任重同住一栋楼（指钓鱼台二号楼），他搞阴谋活动，你为什么不能揭发？’还无中生有地说：‘就是因为你有小辫子给抓在王任重的手里。’‘一提出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就不行了’等等。12月14日，江青还勒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当我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她时，江青瞧了一下就说：‘你那个检讨根本不行，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上。’所以从12月10日起，几乎每次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都要点我的名，批评我一顿，在这个时候，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曾多次说过：‘关锋、戚本禹为什么不可以当总政主任、副主任？’1967年1月4日，在我被打倒、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过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为总政副主任。”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周恩来和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两次大会分别有10万余人参加。刘志坚奉命领导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组织了这两次大会。会议事先报经林彪批准。总理的讲话，几位老师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正义呼声和正确主张，在全军和全国各地群众中获得共鸣。这就引起江青一伙极大不满。事后刘志坚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竟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他们煽动极“左”派学生闹事，张贴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称要对几位老师“批判”。

1月3日、4日，刘志坚遵照总理关于顾全大局的指示精神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当他讲到自己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的时候，康生突然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蛮横地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原来情绪已经平息下来的造反派，立即又被康生煽动起来，当场马上喊叫“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江青和陈伯达火上加油，诬蔑刘志坚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经过他们这一番发作，总理两个通宵所做的工作全部告吹。此后军队院校来京造反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冲击国防部和各军事机关的行动，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1月19日，由关锋指挥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被关押逼供、无情折磨，遭受了长达7年零9个月的残酷迫害。随后，老师们也相继遭到造反派围攻。

#### ◇ 挑动派性混战的“总后台”

中央文革小组开头比较松散。7月中旬办公室成立、江青从上海回京后，小组成员天天在钓鱼台碰头。当时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发生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起作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由刘少奇主持。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不管地方的事，其职权是负责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无权下发指示。小组成员的活动，主要是到各机关、学校看大字报（但不表态），或者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北京什么地方出事，就到那里去。同时接待群众来访。《五一六通知》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江青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陈伯达管的《红旗》杂志和夺权后的《人民日报》，也只对毛泽东负责，从不请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

1967年1月11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让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2月初，毛泽东就在常委扩大会上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各单位、各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以及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办公室的机构逐渐扩大，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多。在办公室前述的文电、简报、调查三个组以外，又陆续成立了两个不归办公室管的单位：办信组和记者站。

办信组负责处理各地给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将来信中所反映的重要情况及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摘要编发在只供给江青等几个人看的《来信择要》内部刊物上。这个组归戚本禹管。王力主管的记者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多时达数百人（记者站主要由王力控制，不让办事组过问）。其中人员开始经总政治部和新华社调来新华社军事部所属各部队新华分社、支社、记者组和常驻记者，集训后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北面的花园村一号院，人数不是很多，均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活动。其后不断扩展，陆续又从部队和部队院校、新华社、《人民日报》、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处调集人员，很快增至100多人（有的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光明日报》记者名义活动）。凡经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派出的记者，不受当地党政机关领导，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这些稿件有的马上抄送中央领导同志，大都及时刊登在记者站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快报》等内部报刊上，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阅读。这个组所出版的《快报》，特点是篇幅小，速度快，记者写来的报道随到随印随发，有时一个钟头内出版多次。

这些由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电讯快报》之类，曾经及时

地向中央反映过不少重要的真实情况，但也常在紧要关头受到江青一伙的蒙骗，通过这种渠道“谎报军情”、“制造舆论”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江青一伙通常采取的手段，就是经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或两个人，先向自己联系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五大领袖”或者其他造反派头头），暗中“泄露”某些“玄机”、散布某些尚未向毛泽东请示或者明知毛泽东一时还不允许而他们又急于动作的“意图”，让这些头头以发表个人意见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传播这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蛊惑人心，造成议论纷纷，沸沸扬扬的气氛。并不知道内情的“记者”听到这些议论加以报道，通过《快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

#### ◇ 七任“办事组长”的最终结局

在江青手下工作，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文革小组一成立，组长陈伯达事事都得让她三分。自从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她就将“代理”变作“取代”，实际上夺了陈伯达的权。尽管陈伯达很快“康复出院”，并不曾“外出”过，她却一直把这个小组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颐指气使，“指挥一切”，什么事儿她都插上一手，对谁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让人们有片刻安宁。

对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江青着眼挑剔、着力打击的是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从成立到消亡的三年间，这个办公室负责人被撤换过六次。前后任职的七届负责人，除肖力（即李讷）外，我和宋琼、王广宇、阎长贵、矫玉山以及王力，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厄运。

我这个办公室召集人，江青一直看着不顺眼。当时虽然自己在文革小组里是尽力“紧跟”的，却总跟不上趟，老受江青一伙指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很不理解”：此前，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十年，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比较熟悉，并常提防莫要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最初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自以为就是以往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继续和深化。及至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会议，看到毛泽东添加的那些火药味浓烈的话，不禁为之愕然与震撼，不知怎样才能真正理解和适应。当时虽受极“左”思潮影响至深，但总觉得江青一伙的言行同自己30年来所受党的教育对不上号。所以在许多事情上跟不上江青一伙的号令。因此，江青看我处处都不顺眼，经常指责我“跟不上”，加以1966年7、8月间，有人向江青献媚，给她打小报告，诬我“反对京剧革命，辱骂江青”。据王力说：“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以前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就说他是叛徒。江青要我派人调查不是叛徒，江青不满意我这也是原因之一。”1966年8月下旬，她“找茬儿”令我停止工作并撤销了这个“召集人”的职务。（其后我又被江青勾结林彪妄加罪名，入狱八年，家破人亡。）

我被撤销了办公室“召集人”的“差事”，改由王力管理办公室的工作。1966年12月初，江青决定改变办公室的名称，成立“办事组”。办事组由宋琼、陈满池、杨子才、张文荣、王广宇五人负责，宋琼、陈满池分任正副组长。宋琼、杨子才、张文荣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陈满池本是记者站的副组长，他继续留在花园村记者站，始终没有到钓鱼台办事组就职。没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军报社的肖力，于1967年1月13日率领军报造反派夺权。宋琼及从军报一同到办事组的工作人员被江青打成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解放军报社造反派把宋琼等人揪回报社批斗。此后，办事组改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同年9月1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回到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1968年1月9日，阎长贵被江青诬为“特务”隔离审查。13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改派肖力为组长。

从1967年1月到8月31日，王广宇是任职最长的办事组负责人。1月初，王力、戚本禹都告诉他：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王广宇任办事组组长，矫玉山任副组长。办事组虽然实际上由他管，却没有正式宣布。王广宇任劳任怨，不计较名义，始终勤奋地工作。江青仍常对他挑剔，把他当作奴隶一样对待，经常找茬，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斥责。江青曾经骂他：“我看你总像还没睡醒似的，一见你就想批评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样没有精神？”她似乎还不知道，所有办事组的人都一直没有假日，无不极度劳累，而王广宇在这里如此辛勤地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一次陈伯达指着王广宇问江青：“他是办事组长么？”江青竟然摇了摇头，弄得王广宇十分尴尬。

钓鱼台16楼会议室隔壁是办公室接听长途电话的房间，江青常拉陈伯达到这里个别交谈，“打通思想”。1966年8月初，为了便于记录各地打来的电话，文电组特请中央办公厅三十九局电话总机技术人员来，在电话机上安装一个扩音机。这本是出于工作需要，极为平常的事，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它的用途。扩音机刚安上不几天，被拉着陈伯达过来“打通思想”的江青看到了，江青大发脾气，硬说是王广宇他们安装的什么“窃听器”。她把经办此事的王广宇找来严厉训斥，强令把电话机拆掉。从此，对王广宇便有了成见。

开会作记录，本是一般惯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却不准作记录，常常因此找茬儿。她在口头上强调什么“机密性”，实际上是心怀鬼胎，一切言行害怕“记录在案”，留下痕迹。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头他曾吩咐：每次开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总理办公室派人作记录。头一次，矫玉山、周家鼎来作记录，“平安无事”，江青没有反应；第二次改换王广宇来记录，周恩来刚开始讲话，江青一见王广宇在作记录，立刻怪腔怪调地问：“我们这个会需要作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列席会议的叶群马上惊慌地说“不是我叫来的！”这时周恩来说道：“是这样的，我说过碰头会上要有人来作记录，不过今天这个会内容可以不记！”王广宇趁机退出了会场。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周恩来是代表中央常委来钓鱼台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他的决定，就这样被江青粗暴地推翻了。这也表明江青对周恩来不尊重和对他的敌视情绪。

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后，第二天晚上，江青就叫张春桥、姚文元找王广宇谈话。张春桥说：“决定你马上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以后需要你的时候再叫你来。”王广宇回到马列研究院，就遭到造反派软禁，马列研究院造反派也不断地点他的名，对他施加压力。不久发生了追查鲁迅书信手稿失踪的案件。1968年3月4日晚上，陈伯达、杨成武、肖力等人突然来到马列研究院“造反总部”，逼王广宇“交代问题”——早先戚本禹曾让王广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取过一份鲁迅的手稿（《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原稿），取回后当即交给戚本禹。这时陈伯达突然前来讨要，并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他们不听王广宇申说，不容许他分辩，当时把他关进功德林监狱，1972年1月又转押到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16日才被释放出狱。实际上，他们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的这份鲁迅的手稿，早由戚本禹交给江青，当时仍收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里。他们拿这个来逼王广宇，只不过要捏造一个逮捕他的“由头”。

在王广宇之后担任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矫玉山也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矫玉山是最早调到办公室工作的，一直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了20个月。1967年1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总理联络员办公室、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时，矫玉山还带领办事组的同志参加了这场接见、合影。不料到12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从香港国际书店寄来的一个邮包。办事组保密室的人打开来一看，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作演员时的有关报刊和照

片。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江青的最大忌讳（当时称作必须“防扩散”的“核心机密”），惟恐遭江青怪罪，马上送交矫玉山。矫玉山看都没有看，立即送交江青信任的姚文元。江青怀疑矫玉山看过这些材料，第二天就叫姚文元到办公室找他查问：邮件是怎样收到的？有哪些人看过这些材料？逼令矫玉山迅速写个报告。两天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会议室密谈，见矫玉山进来，江青竟然指着矫玉山说：“他们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要进行审查！”“他们是特务，是监视我们的，安了窃听器。”张春桥接着说：“是的，现在我连给上海打电话都不敢打了，就是安了窃听器！”1968年1月13日凌晨，矫玉山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江青下令以“特务”罪名拘捕，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被“审查”了七年半之久，1975年5月16日方获释出狱。

原任江青机要秘书并在王广宇被江青撤掉职务后一度担任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关押许多年。在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中两个最得力、最积极的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也被江青妄加罪名关进监牢。甚至长期担任江青警卫员的孙立志，也被江青诬陷“偷”了她的钥匙，而被抓进监狱关了半年，又被送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不准回家，长达七八年。

这些由党组织调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志，多是德才兼优的干部。如王道明，本是1965年曾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杂志上使用大量篇幅、连续表扬，号召全军全国学习的沈阳军区红九连连长（当时才20来岁），被江青调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的。（江青当时点名要调王道明、周占凯等人来的时候，曾向军委总政治部发话：“选送到‘中央文革’来的工作成员，一律要全军最优秀的人物。”）王道明这个苦练刺杀本领“刺刀见红”的年轻连长，调进中央文革一直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地工作，突然被江青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不久就被逼疯了，他常在牢房里高声惨叫：“我不在‘中央文革’，让我回连队去！”1975年5月出狱的时候，他连前去接他的姐姐都不认识了，一看到接他出狱的小汽车，两眼直直地盯着它，突然又尖声狂叫起来：“我不去‘中央文革’，我不去‘中央文革’！”他的姐姐紧紧拉着挥舞着胳膊的王道明，神情悲怆地劝说道：“咱们不去‘中央文革’，再也不去‘中央文革’了！我是姐姐，是你的亲姐姐，我就带你回家，回咱们家去！”情景凄惨，催人泪下。

办公室和办事组前后七任负责人中，只有最后一位肖力“稳坐钓鱼台”，没有任何风险。1968年初，阎长贵、矫玉山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后，肖力即继任办事组组长，直到中国共产党“九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获得了他们追逐的权力，此时正是“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工具的“历史使命”已告终结而“自行消亡”之际。

#### ◇ 江青在“后院”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属的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部分成员，也先后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

1967年1、2月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钓鱼台相继成立了取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组、取代国务院文化部及全国文联的文艺组。前者由王力任组长；后者的成员有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这个组是江青亲自抓的，由戚本禹协助。其后又成立了理论组，也由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当时由中央党校调来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首先遭到迫害。李广文原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兼校委委员。他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进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康生先前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分局书记时，李广文曾在其领导下工作过。李广文看穿了康生阴险奸诈的真面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



康生的罪恶，并于1967年10月8日在中央高级党校内贴出揭露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利用权势，唆使党校造反派批斗李广文，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拘留。1969年11月，李广文被逮捕，入狱历时近10年。1979年8月13日，经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文艺组在沙滩《红旗》杂志社办公。被调到文艺组任副组长的青年作家金敬迈，以及文艺组成员李英儒、刘巨成等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入狱多年。陆公达则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送回原单位中央乐团批斗，因不堪忍受痛打折磨，从四层楼跳下惨死。

金敬迈原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编剧。他因1965年10月出版所写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成名。这本小说的发行数量迅速达到2000万册，金敬迈一时成了广大青年崇拜的作家。江青得知这种情况，先对这本小说发出“指示”——提了三条“修改意见”，经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传达给作者：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作者听了陶铸的意见：“不要改，不要一听什么意见就改。”（当时在场的陈毅赞扬这部小说，对江青的意见也直摇头。）顶住没有改。金敬迈说：“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1967年4月初，江青将金敬迈从广州召来北京。4月11日，她在京西宾馆当着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及谢富治、叶群等许多人的面，向金敬迈发难。江青一见金敬迈进门就劈头训斥说：“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接着又是一阵恫吓：“我告诉你，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雁南飞》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当时报刊上批判它“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是为了保护你，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按：江青认为，“最后四秒钟”的描写，是写了欧阳海“对死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是污蔑了英雄，是大毒草。）

金敬迈被迫对《欧阳海之歌》作了修改。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这样一来，在江青看来，好像小说就变成了“她的”了。她对金敬迈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江青让他参与领导五一节文化活动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活动。五一节，金敬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当天晚上，江青亲自带领他去见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毛泽东。江青肉麻地介绍说：“主席！这就是‘我们的作家’金敬迈同志。”5月23日，又让金敬迈在首都纪念《文艺讲话》发表25周年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江青指派金敬迈任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副组长。……

金敬迈以后回忆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无限感慨地说：“一切都像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为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又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再不久，我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但是事隔不久，江青的残酷迫害却又降临到金敬迈头上。这年国庆节前，谢富治、戚本禹等叫金敬迈去北京图书馆清理30年代涉及江青的书报刊物，送往沙滩中央宣传部办公室，锁进保险柜里封存。此事刚一办完，参与其事的文艺组成员刘巨成就被江青下令抓起来。关于金

敬迈，江青说：“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国庆节后，戚本禹秉承江青旨意，就在文艺组召开会议批斗金敬迈。当时并未宣布他的“罪名”，戚本禹说：“金敬迈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

接着到来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金敬迈说：“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令，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毛主席南巡时，阴谋绑架毛主席’的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里，七年零四个多月，2678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劳改，485天——两项相加，3163天。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金敬迈在狱中饱受折磨和迫害，1975年5月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虽然年方45岁，却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了。

理论组由戚本禹负责，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内。调来主持全组工作的一位同志，原是《红旗》杂志的干部。以后又陆续从部队调来廖初江等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戚本禹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刘少奇的全部著作，整理、编印出来“供批判用”，先后印出过八本。1968年1月13日戚本禹被捕后，这位同志就被揪回《红旗》杂志社批斗，造反派竟诬陷他“包庇刘少奇”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说他对刘少奇“假批判，真包庇”。因他不堪忍受长期的残酷批斗，一度精神失常。他把白布单撕开，缠到头上“戴孝”，手里打个白幡，自言自语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光景凄惨。以后他又被谢富治抓到公安部关起来，直到1975年夏天才获得释放，从此以后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干部，都是由党组织从各地区各单位抽调来的。这些同志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信不疑，怀着对毛泽东真诚的崇拜，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参加这场运动。尽管对这场突然到来的政治风暴缺乏精神准备，还“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基于对党的忠诚，对毛主席的热爱，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力图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其时这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工作节奏十分紧张，特别是在办公室（办事组）工作的同志，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相当辛苦。——当然，因为受到个人崇拜、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人虽然在有些事情上有怀疑和抵触，却不可能不执行和照办，这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说错话、做错事，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各系统就出现了“全国内战，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景色秀丽的钓鱼台正是制造这场全面内战的一个策源地。每个人都经受着这场风暴的严峻考验。这些人来到这里工作不久（例如小组成员尹达被赶走时距离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正式公布还不到三个月，金敬迈只在文艺组工作四个月零三天），就被江青当作“革命对象”加以迫害：被批斗，被监禁，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残酷的折磨，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九死一生，有的还牺牲了生命。

历史是最无情的，对任何人都是最公正的。林彪、江青一伙已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康生、谢富治死后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骨朽人间骂未销。”他们将会遗臭万年。党已平反了林彪、江青所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广大受迫害者得到了平反。正如金敬迈在自己的冤案平反以后所发出的无限感慨：“本来世事自有公论。谁优谁劣，谁个流芳百世，谁个已被或是将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在乎传媒如何说法，老百姓心头，早就刻着呢。不是有句词叫‘铭刻在心’吗？”他的这些话，正道出了千百万被害者的心声。

□ 《纵横》2006年第1期

~~~~~

## 【史海钩沉】

###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

· 尹家民 ·

说到“中央文革小组”，先得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起。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又批评道：“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根据这两个批语的精神，文化部及所属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负责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5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了这个过程：“1964年7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1964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3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3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5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5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我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姚臻很得意……”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研究了由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发端的全国文化理论界情况，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

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4月9日至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书记处只能照办，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也作了“初步检查”。书记处会议还作出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这个小组写成的文件主要有两份：一是陈伯达、王力主笔的《中共中央通知》，后因于5月16日通过，故又叫《五一六通知》；二是以康生为主编选的该《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14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作了3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其中就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语。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再次批评起《二月提纲》。毛泽东认为全国、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要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陈伯达和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自不待言。说到张春桥，他是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文人，16岁时就写文章批判施蛰存、老舍、臧克家这些当时在文学上比他成就大得多的人。1958年，张春桥在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论文，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有些人“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引起了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的兴趣，指示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写下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春桥基本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毛泽东似乎也看到了张春桥的极端情绪，但似乎更欣赏张春桥的某种挑战性，打破常规。加之江青、柯庆施的推荐，毛泽东开始重视张春桥。

至于姚文元，则是因“反右”运动中一篇短文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而大红大紫则是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通天跳板，从几个普通人一跃而为九大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见中央文革小组地位之显赫。

陈伯达对毛泽东提议他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他在这场政治风暴中仍然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忧的是与有着特殊身份的江青同组难以相处。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江青当组长。但毛泽东对江青的使用一直有着自己的分寸。据陈伯达自己回忆，在“文革”之初，周恩来奉毛泽东的指示同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陈伯达以不能胜任为由不肯接受。谈过两三次，陈伯达都是这个态度。周恩来不满地说：“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陈伯达这才接受。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我是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陈伯达不好再推了。当周恩来要他列个小组的名单时，陈伯达想这件事既然是毛泽东的意思，现在江青又在轰轰烈烈地搞“样板戏”，日益受到中央的重视，他便首先把江青的名字列入，并找机会向毛泽东表示：“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这个提议理所当然地被毛泽东否决了。于是，他又想到毛泽东要

拟文件，有时曾指示他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风头仍劲的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恩来。但当江青进入角色时，她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当这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的成员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成立会议时，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反对，说：“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一时说不出更充足的理由，于是拿出她的“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第二天，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18日，林彪在会议上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另准备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再选4人，名单确定后再通知。

后来补充的4人为：华北局的郭影秋，东北局的郑季翘，西北局的杨植霖，西南局的刘文珍。中南局和华东局因有王任重、张春桥，不再另增人选。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即进驻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初期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做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马不停蹄。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做秘书，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住不下，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由康生主持在11号楼开会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决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轶欧负责，穆欣为召集人。下设文电组，由穆欣兼管；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管；调查组，由曹轶欧负责。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穆欣，副主任为戚本禹和曹轶欧。继任的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时间也不长。到1966年末，办公室改称办事组，由解放军报社的宋琼担任组长。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由王广宇负责。再后来改为解放军报社的李讷负责，当时她化名肖力，取“小李”谐音。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7月20日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即住进钓鱼台；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都住在这里；其后，王任重、刘志坚等也住进来，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7座楼房。17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他们所用。

8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到了1966年底，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1967年元旦刚过，1月4日，陶铸即被打倒。随之，王任重也被打倒。同月4日，刘志坚也被打倒，谢镗忠是总政的，自然也不免被打倒。到1967年8月，王力、关锋又被揪出来。9月，穆欣也成了“特务”。1968年1月，戚本禹又被揪出。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了。陈伯达渐渐地向林彪靠近，康生公开露面不多，所以，1967年8月以后的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代名词了。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内部排斥异己，陶铸这个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首先成了他们打倒的对象。

陶铸到中央以后，因与刘少奇和邓小平只是一般工作关系，加之敢放炮的性格，中央文革对他持欢迎态度的，想日后利用他向刘邓开炮。但陶铸与他们格格不入，还是站在许多老干部一边，与江青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

陶铸的被打倒，还得从王任重说起。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很得毛泽东的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到北京，任副组长、北京市“文革”顾问。但王任重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王任重架子大，自己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很难合作下去。王任重因肝病天天发低烧，不得不去广州养病。就在这时，武汉的造反派从王任重儿子那里发现了王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造反派抓住这一点，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在武汉三镇大闹起来。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此事，煽风点火，围攻王任重。陶铸见状十分着急，为解王任重的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目前首要的是让他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找来了，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文革小组成员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全部对准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攻，最后由江青、陈伯达、康生出马。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执行的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是他们的代理人，等等。政治局委员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李富春最后说了一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但毛泽东还是保了陶铸。

只隔了一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他问：“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坐下后，毛泽东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约1个小时，态度很随和：“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毛泽东同时批评了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特别是对下去视察的事，毛泽东多少有些不满：“你为什么还不去呢？”

陶铸解释说：“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说完话，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指示陶铸说：“这些同志烧还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3个月也可以。”毛泽东还特意提到受到一些造反派批判的陶铸的两本书：“你的那两本书，曾志（陶铸夫人）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看来毛泽东并不赞同陶铸的说法，毛泽东的意思是，现阶段还

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天真地以为，毛泽东出面保自己，江青之流将奈何不了他。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就在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1966年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了密切联系，随后在晚上10点钟强迫陶铸接见。原本说好第二天接见的，但他们下了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陶铸只好答应。陶铸本来就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一点就着。在双方僵持不下，又强迫陶铸回答问题时，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的话被录了音，被说成是“用武力镇压群众”。

1967年1月4日下午5时，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到晚上9时，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那天晚上铸陶12点多才回到家里，外面发生的事他并不知道，虽然中央文革就在他隔壁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他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也不知道。凌晨2点多，周恩来来电话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但是，从这一天起，陶铸就失去了自由。

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严厉批评道：“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12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

但陶铸最后还是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与此同时，拥有重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乘着各单位第一、二把手被揪斗，工作组撤离，领导职位空缺的时候，以各单位少数派为基本力量，在北京到处接见群众、开会演说，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实际权力。社会动乱，生产下降，军队受冲击，党政军领导、特别是一些还未被打倒的军队将帅，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爆发了所谓的老师们“大闹怀仁堂”事件。

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汇报，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王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听取了汇报。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陈毅、谭震林等人做了毫不留情的指责，大意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他转向叶群，依然气愤地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搬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虽然说的是气话，但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性确是不容置疑的。

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

毛泽东按照他的思路布置说，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请假检讨”。说完，毛泽东起身，愤然走出会场。

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在2月27日陈伯达送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上，毛泽东批示道：“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是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

后来，康生将“大闹怀仁堂”事件上纲为：“这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谭震林等人只好从大局出发，努力改变立场，一一做了“检讨”……

自此以后，中央党、政、军的“碰头会”中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文革派”手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牵头，但成员大多是江青一伙，后来又增加了林彪线上的吴法宪等人。

陈伯达和江青因打倒陶铸等问题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不满更重。

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

据叶永烈著《陈伯达传》记述，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到40℃，住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的正式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陈伯达在回忆录中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



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些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赋予了权力，同时也对它加以限制。毛泽东在“文革”10年中多次批评过江青，说她“急不可待”、“有野心”，不让她出头，不让她担任实职，不让她“组阁”，甚至在会上骂过“江青混蛋”。准备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在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道：“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尤其是在1974年和1975年，几近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但却始终没有实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他还需要这些人来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

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对与会的人说：“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特殊的机构给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特殊的权力，他们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正与另一个特殊的群体——林彪集团争夺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是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 《党史博览》2006年第1期

~~~~~

## 【历史回顾】

### 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

• 戚本禹 •

首先，我再次感谢您大老远把《xx》杂志（2002年2月号）《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的复印件寄来，读了这个报道，我才知道海外正在谬传毛泽东命汪东兴暗杀田家英的流言，并且得知这种荒诞无稽的流言，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流言的力量，不可忽视。

#### ◇ 我的诬陷置田家英于死地？

前几年，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责任，是集中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我与关锋、王力的身上，说他的死亡是我们诬陷的结果，具体迫害他的人是关锋、王力和我。在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书籍、杂志上的各种报道连篇累牍，读不胜读。这些报道除了一些确有其事的叙述，其他一大半，而且是要命的一大半，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传闻或捏造。看了这些报道，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的话。连我们的大史学家居下流时，对铺天盖地的谤议也没有办法，我又能怎么办呢？况且，我当时还是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任何出版单位，都不能发表我的文字和谈话。我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失败的角斗士，除了挨打，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以古人明训“谣言止于智者”来自我安慰了，虽然当今世界上“智者”不是很多。

但是，现在不对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又上移了，而且移到中国过去最高的领导人毛泽东头上去了。司马迁的话要修正了，如今是“居上流者亦不易，上流谤议更多”。

《x x》杂志的报道是记者罗冰所写。据说，罗冰是香港的资深记者，被称为“大陆报道权威”，但他写的这篇东西却是马失前蹄。

据罗冰所言根据中南海的秘密档案“原来毛泽东认为田家英知道党内太多秘密，怀疑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对他很不放心。于是，汪东兴带着内卫到田家英的寓所，在汪的暗示下，内卫开枪打死了田家英。”（《x x》杂志2002年2月号12页）

罗冰得到的中南海秘密档案还有编号：

-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 1978.7—00612号
- 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0.4—00174号
- 三、中共中央档案局 1980.4—009014号
- 四、中共中央办公厅 1980.9—00797号

#### ◇ 秘密档案来源可疑

罗冰这四件中南海秘密档案，来源可疑。罗文中转述了这些档案的内容，但没有原件的照片。。看来，它是别有用心的制造人制造的假档案，罗冰上了一个大当。

文物的真伪和档案的真伪都可以鉴别清楚。

我从解放初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接触中央的档案很多，我自己也编制过档案，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时还管理过档案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编号，除了头一件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的标志外，其他则既无部门，亦无类别、体裁等标记，这是不合规范的。如果说某个文件漏写了某项标记，这是可能的。但四个文件都漏写了不只一项标记，则绝对是不可能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真实的档案，不管它是机密的，还是非机密的，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 / 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志。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骇人听闻，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罗冰档案的第一件，即1978—7—00612号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的谈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罗冰档案的第三件，即1980—4—009014号说，汪东兴笔录交代“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转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此后，双方争吵起来，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枪，把田家英打死。

这两份档案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去同田家英作“挽救性”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一小时后（即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田家英死了。但

是在怎么死的问题上，两份档案打起架来了。一个说田家英是自己开枪自杀的，一个说是汪东兴带去的内卫开枪把田家英打死的，据罗冰的档案，汪东兴的内卫名朱国华，“时任中央警卫局五中队队长，即内卫处处长”。后来，朱国华也神秘地死了，死因不明。

这件事在罗冰档案的第四件，即1980—9—00797号中说得又不一样。这份档案，据说是汪东兴向华国锋的交代。他说，“谈话中，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

这样一来，汪东兴似乎变成了一个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人，今天说田家英是自杀，明天说田家英是他杀，后天又说田家英是他叫人开枪打死的。据我所知，汪东兴虽然文化修养不是很高，但有思维能力，说话也清楚，不至于像罗冰档案写的那样窝囊。

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中央警卫局五中队的编制，所谓“内卫处”也是建国以后从未设立过的机构，中央警卫局则未曾有过开枪者朱国华这个人，当然，更没有后来神秘之死的情节。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 ◇ 删掉毛的指示，被江青告发

田家英被审查原因的事实真相是：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我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总理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他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的。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 ◇ 周恩来指定我接替田家英工作

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逢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逢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逢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

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反省，不要出去了。”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曾与汪东兴通话，告知一切。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他。这时我又在田家英处用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与汪东兴通话，告诉安部长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琮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我工作，但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逢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 ◇ 自杀前的时间倒数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琮到场，我交代他们和逢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部长与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我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情况。我说，我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他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当然由他负责，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琮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来不及到会。他说，那么他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五六点钟，王妙琮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她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我叫她与逢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田家英秘书逢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 ◇ 田家英深夜叫我到永福堂见面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琮到那里。王妙琮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逢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

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么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

#### ◇ 立即赶到自杀现场

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

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事发后，田家英的家属和秘书仍住永福堂，也没有人发现那里有杀过人的异象。

中央来的人，在观察现场以后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火化（送前征得家属同意），并由安子文、戚本禹、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

5月2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的年轻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可以看到：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而且直到十点半中接到田家英死亡报告电话时，都没有离开。他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中南海永福堂和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察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 ◇ 重温暗杀基洛夫的神话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耸人听闻的《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假档案呢？人们只要回忆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轰动全球的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谣传，就可以明白了。基洛夫明明是斯大林的追随者，可是，企图打倒斯大林的人却偏要捏造事实，说斯大林因为害怕基洛夫超越他而秘密暗杀了他。许多人听信了这个编造得非常巧妙的谣传，对斯大林厌恶起来。世界性的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风潮就是如此这般地被煽动起来的。近几年，苏联共产党档案解密，人

们从封存多年的档案中，弄清了基洛夫被暗杀与斯大林全无关系。但苏联已经亡国，苏共已经亡党，此时再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南海秘密档案的制造者也许从昔人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他们企图以这样的假档案推翻毛泽东的伟岸形象。但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至少是多数，是很难相信这批古怪的秘密档案的。因为它们与毛泽东的人格和他的一贯主张不符合。当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以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即使他对田家英不满，也不需要去暗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田家英。当时知道党内机密最多的人应是杨尚昆、胡乔木，但直到毛泽东去世时，杨尚昆、胡乔木谁也没遭人暗杀。当时倒确实有人要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请示毛泽东，毛的批示是不准杀人。

#### ◇ 我要为这个历史要案负责

有一位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朋友，在看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以后，对我说：“以前他们都说你害了田家英，现在好了，害田家英的是汪东兴、毛泽东，没你什么事了。”但我看了这篇报道，没有半点高兴。虽然我早已被赶出“教门”（开除党籍已三十五年），但我从不敢忘却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事件”。我不能为一个对我有利的虚假报道而不顾历史事实。明明是中央令安子文为首的三人小组同田家英谈话，怎么能说是毛泽东令汪东兴同田家英谈话，而且暗杀了他？我决定如果要毛泽东承担田家英案的责任，那不如由我来承担为是。原因是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审查田家英，也批评过他，但没有为他作结论。而我是田家英案的具体办案人，是当时田家英案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是这个三人小组里唯一在世的成员，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田家英案的详情和一些值得追索的疑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田家英和毛泽东，田家英和彭德怀、刘少奇，田家英和杨尚昆、汪东兴，田家英和江青、陈伯达，田家英和我等等，其恩恩怨怨，是非曲直，也要细说才弄得明白。还有，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些，只能待有机会时再说了。

最后，我只想再补充几句话：我以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扑朔迷离，除了上面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谣言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过去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现在又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圣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光点，也有暗点，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历史总有其显露真山真水的时候，田家英的子女也都年轻，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一切。

□ 《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